

大历史视野下的香港变迁与发展

——《香港志》总述读后感

海黄梨

今年开年，首部以香港冠名的地方志《香港志》首册《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一书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40多家书店闪亮登场，图书一上市，就引起广泛瞩目，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捧。为此，新华社发表了《香港志：以历史之炬，照亮香港未来》一文，隆重介绍此书。笔者承蒙参与主编的香港史专家刘蜀永教授信任，在出版之日阅读了此志总述，感慨良多！

按照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出版计划，将分批编纂出版《香港志》，这是一个浩繁而艰巨的系统文化工程，据说将分批出版60多卷。全国政协副主席、团结香港基金会主席董建华形容《香港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现任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香港志》可以让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了解香港与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谢伏瞻专门表示热烈祝贺，给予肯定。《总述·大事记》是《香港志》首册，在我们国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其公开发行颇具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

《总述》五易其稿，篇幅长达5万多字，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香港从公元前5000年先民活动到香港回归20周年的7000多年间的历史与现状。以总述和大事记作为《香港志》首册，“提纲挈领”起到勾勒香港历史和现状全貌与特点的作用。我阅读《总述》之后，有三个深刻印象：

一、填补香港修志空白，充分体现香港与国家血脉相连关系。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书影

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志属文史”，地方志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民族力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文化作用。正是依靠地方志“接力棒”式的连续记载，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才得以绵绵不断传承下来。

从建置沿革史看，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安县，新安县多次编修过县志，留存至今的只有康熙和嘉庆两个版本。在这两个版本的《新安县志》里，记载了香港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可以说《新安县志》是完整记录香港古代史的唯一地方志。1842年之后，由于香港地区被英国人逐步占领，再未进行任何修志工作。

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香港有识之士就开始积极推动香港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提出编修《香港通志》（后改称《香港志》），以记录1819年以来香港历史与现状。由于香港被殖民统治太久，香港社会对地方志几乎全无概念和无修志意识，推动起来十分艰难。2009年，爱国爱港人士成立香港地方志基金会，陈智思出任主席。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二刘一丁”（刘智鹏、刘蜀永、丁新豹）出任正副主任。机构尽管成立了，但由于是自负盈亏没有政府实际支持而举步维艰，尽管如此，这个团队还是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40多本地方史志图书，从中积累了不少修志经验，逐渐地让香港社会了解地方志的独特意义和文化价值。

2009年8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刘智鹏、刘蜀永专门来深圳，与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建立了友好单位关系，这是全国地方志系统唯一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建立友好关系的单位。期间，双方合作编辑出版了《中英街与沙头角禁

区》画册，在香港书展上引起反响。2012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时，两地方志机构还在深港两地举办“百年中英街”专题图片展览，深受两地市民的欢迎。

2019年9月，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支持下，香港修志工作终于见到曙光，由董建华先生领导的团结香港基金会牵头，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开始实施《香港志》编修规划。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地方志中心负责人林乃仁、编辑部总监孙文彬等人专门跨过深圳河到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协商座谈，请求支持他们编修《香港志》，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给予大力支持。

经过香港地方志中心专家们的艰辛努力，《香港志》首册历经一年多完成编纂出版，终于填补香港两百年来没有修志的空白，圆了香港人有香港志的梦想。

《香港志》总述由“二刘一丁”出任主编，以五万多字篇幅介绍香港7000多年的历史脉络、发展历程和自然与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回答了香港的由来、香港人的由来、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等诸多关键问题。

总述记述了早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香港就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香港地区在秦、汉、三国至东晋初年共五百多年的时间内，属番禺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至唐至德元年（756年）四百多年里，属宝安县管辖；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起，后经历五代、宋、元，至明隆庆六年（1572年），前后八百多年的时间内，属东莞县管辖。”“从明万历年元起，到十九世纪英国逐步占领香港地区为止，除清康熙五年至八年（1666年—1668年）一度改并外，香港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新安县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深圳和香港。”总述清晰地梳理了香港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

系，以及与今日深圳血脉相连的历史联系。

笔者接触一些香港年轻人，他们根本不了解香港与新安县的血脉关系，不知道今日深圳与香港是同根同源的血肉关系，更不知道香港与国家的密切渊源。因此过去一年多，香港“港独”势力掀起的“反修例风波”，参与“黑暴者”几乎都是对历史无知的年轻人，他们对国家缺乏认同感，几乎没有家国情怀，数典忘祖，令人痛心！这本《香港志》总述和大事记的出版，不仅填补了香港修志的空白，而且能够增强香港市民家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正因为如此，此志的公开出版，充分体现其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发挥了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客观记载，直面问题，体现了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地方志讲究客观记载，讲究秉笔直书，讲究“述而不论”，以史料说话。《香港志》总述做到了这一点。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此志与内地修志不同，是在政府支持下由非官方机构组织修志，学者主持编纂工作，因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修”，但记载做到了客观、准确，具有公正客观科学的特点。一是以平实的文字客观记载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成就。指出香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几十年中，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香港自由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演变，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商港。”特别记述了麦理浩时期几项成就：十年建屋计划发展出六个新市镇、33个公共屋邨、16个居屋屋苑及重建11个旧式屋邨，受惠人口高达96万人；成立廉政公署，成为战后香港社会发展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对

香港的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影响深远；改变劳工政策和福利政策；实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等。总述还记载了香港法律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指出“法治精神是香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也是港人引以自豪的核心价值。”二是面对历史上存在的问题甚至香港回归后的问题也不回避，如实记载。如记述香港作为外向型高度开发的经济体，其经济比较容易受到外来震荡的影响。“例如1997年回归以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九一一”事件、2003年SARS疫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等一连串的冲击，再加上内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香港先后于1998年和2009年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香港回归以后，不是一切发展都顺利，而是面对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如记载香港土地制度，指出“特别是千禧年以来，土地发展速度缓慢，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供应严重短缺，令地价高居不下。”三是如实记述香港各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彰显尊重历史的精神。如记述了“香港与辛亥革命”“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香港与抗日战争”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以时有序记述了“九龙及荃湾暴动”“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六七暴动”等事件。记述事件时，不回避敏感问题。如记述“六七暴动”：“1967年，由于社会的固有矛盾，加上“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香港爆发了战后英治时期最长、规模最大的社会动乱，社会上一般称‘六七暴动’，左派则称其为‘反英抗暴’。”这是尊重历史的体现，彰显了地方志客观记载的风格。四是高度肯定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所做出的贡献。记载了香港大力支持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贡献。指出“国家的改革开放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首发式

有的机遇。港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成为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香港成为内地建立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基地。”“港商在内地投资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共同繁荣。”这些记载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香港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密不可分的历史进程。

三、见解独特，观点新颖，为香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

过去旧志不设总述或概述，在志书之首设置总述或概述，是新编地方志的创新与特点。《香港志》首册设总述是借鉴了新编地方志设总述或概述的创新体裁，通过总述给读者呈现香港历史变迁与发展历程的基本面貌和特点，这篇总述既要传承地方志的“述而不论”的特点，也要通过丰富的史料彰显修志者的研究功底与学术水平。《香港志》总述采用横列特点的写法，全面介绍了香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特色。共分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人口流动与移民城市的

形成、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独特地位、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国两制”、多元文化荟萃之地等七个部分。在七个部分的记载中，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和新颖的观点：1、总述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香港回归二十年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二十年，正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时期，国内外对此褒贬不一，如何记载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问题。总述在政治部分，既充分肯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对这些曲折的原因提出修志者的看法：“回归以来，香港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错综复杂。香港未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加上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途径比较曲折。英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及房屋问题又未得到妥善解决。思想和教育方面，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成效不彰，年轻一代国家认同感薄弱，未能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国家的发展。外部环境方面，反精英、反权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国际关系亦发生重大变化。”这正是香港回归之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2、强调华人对香港社会的贡献，也肯定非华裔人士对香港的贡献。香港开埠以来，华人是人口的

大多数，是香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过去强调华人的贡献和作用并无问题。但百多年来，在香港建设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的进程中，非华裔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述指出“一些英国专业人士来港创业，成为香港的传奇。他们创办的专业公司，例如的近律师行、巴马丹拿建筑公司及利安顾问有限公司皆成就显著。”“在众多非华裔人士之中，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是继英国人之后最早立足香港的欧籍人士。葡萄牙人对香港印刷业贡献很大。”“一些在香港人数很少的族裔也出现过杰出的家族或个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基层民众，也为香港的保安、家务服务等做出贡献，展现香港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族裔和文化之间包容互惠的精神。”这正是香港海纳百川包容精神的体现，也是香港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3、梳理史料，记述与肯定中共对香港的战略定位和举措。这是一个敏感政治问题。总述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中共在各个时期对香港的战略定位和举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利用的目的是“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先后

出台的广交会、东江水供港、三趟快车等举措，是中国政府从经济上支援香港发展的典型事例。4、提出香港是南北文化交汇地的观点。在“多元文化荟萃之地”部分，不仅指出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之地。这个观点是在翔实史料基础上提出来的。历史上，文化人至少有四次较大规模的南下香港潮，推动香港文化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文化人四次南下潮分别是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时期、战后初期和1950年代初期。文化人南下香港对香港的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与南下文化人关系极大。他们为香港的出版业、教育、文化艺术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香港文化和文化人也北上，尤其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香港普及文化中的电影、电视剧和流行音乐在内地产生极大的冲击力，为内地的文化生活带来多元化的选择，增进了内地民众对香港社会和文化的了解。5、指出香港的慈善文化增进了与内地的关系。“扶贫济困”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在香港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香港不少非政府慈善团体，为市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涵盖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港人对内地同胞的关爱之情。香港多次赈济内地各种重大自然灾害，

加强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同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企业家、慈善家和市民一直大力支持国家教科文体事业的发展，如李嘉诚、邵逸夫、包玉刚、田家炳、王宽诚、霍英东、曾宪梓等均都热心支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对推动内地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总述记述“还有无数港人和香港社团通过希望工程、苗圃计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内页

划、无止桥或其他方式，默默地为国家教育贡献力量。”⁶、提出五大因素影响香港发展的观点。香港是依靠什么发展起来的？香港的发展只是英国人的功劳吗？总述提出五大因素是促成香港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深水港；二是英国人的自由港政策；三是香港人的灵活头脑和拼搏精神；四是中国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五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等，正是这些重要因素创造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

总之，《香港志》首册中的总述是一篇客观、准确、科学、全面记述香港7000多年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既遵循地方志“述而不论”的传统写法，又尊重历史，不回避历史遗留问题，如实记述；同时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充分记载香港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历史情况，展示了大历史视野下的香港变迁与发展。尤其是通篇较好地处理了几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非官方机构主持编纂、学者主修与权威记述的关系。在内地主持编纂工作的是政府机构，体现的是“官修”，而《香港志》是由非官方机构香港地方志中心主持编纂的，参与编纂工作的都是香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与内地的“官修”不同，但其记述彰显的权威性不亚于“官修”，因为总述是广泛征求了学界、政府有关部门和由专家组成的编审委员会意见，反复修改，五易其稿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保证了总述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正确处理香港变迁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既记述了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后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记述了国家对香港发展的大力支持，两者血脉相连，唇齿相依，是命运共同体。三是正确处理客观记述与坚持

国家立场的关系。英治香港156年，尽管是殖民统治，但港英政府的管治既有深深的殖民主义烙印，也有某些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总述给予客观记述与肯定。但是总述也专门记述了“香港的回归”与“一国两制”的设想与实践，这是我们国家坚定不移的立场。总之《香港志》总述以史说话，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真实、科学、全面地反映了香港7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与现状，是一篇值得肯定的地方志总述，也是一篇纵贯古今、串起历史与现实的权威“香港简史”。

《香港志》首册出版后，受到香港市民欢迎和全国方志界的肯定。但在香港也有个别人跳出来，撰文指责《香港志》失实偏颇，不认同总述总结香港成功的五大因素的观点，否定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等，原因是此人反共立场先行。观点偏颇的其实就是这种人。

笔者非常赞同新华社对《香港志》首册出版的肯定：以历史之炬，照亮香港的未来！我们相信香港明天会更美好！借此机会，谨向为《香港志》编纂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所有修志同仁和专家学者表达我的敬意！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志》全部完成编纂出版，把香港的历史与当下的繁荣稳定完整记录下来，借助志书这一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所有同胞知香港、爱中国，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香港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新突破。

2021年1月31日写于深圳方志馆

作者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